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十六卷二期

2016年12月，頁1~28



臺灣文化在世界文化中能扮演何種角色？

——John W. Meyer新制度主義對臺灣 教育與文化研究的啟示

陳灤翔

摘 要

本研究以Meyer等人在德國出版的論文集裡幾篇新制度主義的基礎文獻作為探究的起點，介紹該研究取向的理論架構。首先描述和比較新、舊制度主義的異同；其次說明Meyer等人對「世界文化」、「世界社會」等術語的關聯與界定；第三，探究Meyer等人如何從與其他幾種新制度主義的研究取向之異同中，確立自身的取向和論述；第四，依循著Meyer等人的立論去瞭解驅動「世界政體」的社會單元；第五，歸納和詮釋Meyer新制度主義意義上的全球化機制。從Meyer等人的實證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教育的研究與實踐可以被包含在「全球模式」的範疇裡，且臺灣的教育與文化研究在新制度主義的理論框架下能夠呈現出幾種不同的態度或樣貌。最後本研究指出，臺灣的教育學術有貢獻世界文化的潛力。

關鍵詞：新制度主義、世界文化、理性化他者、全球化

• 本文作者：陳灤翔 德國耶拿大學教育與文化研究所博士。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TJSE/?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2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十六卷二期

- 投稿日期：104年11月5日，修改日期：105年11月23日，接受刊登日期：
105年12月10日
- DOI：10.3966/168020042016121602001

*What Kind of a Role Can Taiwanese Culture Play
in the World Culture? —John W. Meyer's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Research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Taiwan*

Luo-Xiang, Chen

Ph. D.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Jena, Germany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review of several articles by Meyer and colleagues that have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Germany. Firs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 called old and new institutionalism are described. Second, critical terms for new institutionalism such as 'world culture' and 'world society' are introduced and defined. Third, several kinds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are presented, so that Meyer's approach can be seen more clearly. Fourth, there is a discussion of how social units within the 'world culture' and for a 'world polity' work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 of Meyer and colleagues. Next, the author summarizes and interprets the mechanisms of globalization within Meyer's concept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From the findings of their empirical studies, it can be seen that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can be incorporated within a kind of 'worldwide model'. In addition, several patterns or attitudes of educational or cultural research in Taiwan can be described using the framework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Finally, the author notes that results of Taiwanese educational research are potentially able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world culture.

Keywords: new institutionalism, world culture, rationalized others, globalization

壹、前言

John W. Meyer於1965年自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取得社會學博士，翌年進入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社會學系任教，1978年成爲正式教授並於2001年退休，成爲該學系榮譽退休教授。他的學術專長包含教育社會學、政治社會學、比較及歷史社會學、全球化與世界社會（world society）研究、組織研究等領域，迄今已發表超過229筆的期刊論文和專書著作，並仍活躍於上述學術領域。Meyer退休後多次受邀到德國各地進行訪問、講學或擔任講座，例如2003年在柏林的馬克斯·普朗克教育（及人類發展）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Bildungsforschung）、¹2005年在哈勒—威登堡大學（Martin-Luther-Universität Halle-Wittenberg）、2006年在比勒費爾德大學（Universität Bielefeld）等（Meyer, 2014）。他在德國教育學界激起新制度主義的當代討論，至今已在德國不同的教育學科或領域，如教育社會學、教育哲學、課程研究、高等教育、公民教育（politische Bildung）等，引發不少的學術討論和出版。

質言之，德國學者近年來引介及摸索Meyer的學說，發現不論是在教育研究或組織研究方面，都不容易直接連結到德國相關領域既有的研究成果，所以有些學者試圖從Meyer新制度主義的經典文獻著手，企圖從他的理論和基礎研究中去開啓新的討論空間（Koch & Schemmann, 2009; Meyer, 2010: 5²）。循著上述的脈絡，並基於德國耶拿大學（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全球教育學院（Kolleg Globale Bildung）對Meyer（2005）出版的德

¹ 馬克思·普朗克教育（及人類發展）研究所的官方英譯名稱爲“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Development”。

² 由於Meyer這篇2010年發表的期刊論文〈世界社會、制度論與行動者〉（World society, institutional theories, and the actor）能提供本文若干參照和補充說明，為求精準以及使讀者方便對照，故也列出所引原文的頁碼。

文版論文選集《世界文化——西方的原理原則如何滲透到整個世界？》（*Weltkultur: Wie die westlichen Prinzipien die Welt durchdringen?*）的討論，本研究以該書的幾篇基礎文獻作為探究Meyer新制度主義的起點，³藉由爬梳其理論內涵，對臺灣的教育研究提出蘊含新制度主義的觀點與看法。

貳、Meyer新制度主義的理論架構

一、Meyer所認知的新、舊制度主義

Meyer指出，為了回應戰後的現代社會，以及定義創造和穩定行動者系統的制度，制度主義的論述到了1970年代再一次地興起並做出更新，這些論述特別關注全球層次的問題，也在分析組織系統及現代社會的個人行動者之中尋求發展。如果舊制度主義探究的是將個人、團體與社會嵌入其中的制度，那麼新制度主義主要探究行動者：他們擁有既受限又被賦權的施為能力或稱代理能力（agency），同時他們也被認為是自主的、有疆界的，以及是帶有目的的（Meyer, 2010: 3）。新、舊制度主義的比較請參見表1。

二、全球模式、世界文化與制度

關於Meyer對全球化與世界社會的論述，概括地說，是始於一個看來極其普通的觀察和提問：為何在以民族國家（national-states）所組成的現代世界之不同社會中，在許多令人感到意外的層面上有著結構上的相似，並且這些社會的變遷也呈現一定程度的近似？質言之，全球化不是現代才發生的現象，國家與社會的形塑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涉及一些全球模式（worldwide models），但是Meyer指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由於世界社會的

³ 國內過去的相關研究多出現於政治學領域、社會學領域或組織研究，近年來則有少數文獻出現在教育社會學及課程研究（李英明，2005；徐超聖，2004；蔡德馨，2005），但大致上來說，對於Meyer新制度主義的基礎理論探究仍少。

表1 Meyer新制度主義及其所認為的舊制度主義之觀點比較

觀點	舊制度主義	Meyer 新制度主義
對人類生活的看法	看作是嵌入在制度裡的：人被設想為習性的創造物；團體被嵌入在習俗裡；社會則是反映了文化。	社會同樣是一個制度系統，但是：個人扮演著合法且勝任的行動者角色，而非被僅僅是嵌入的參與者；行動者能夠建立歷史與社會。
探究的主要課題	有許多對非現代的社會安排的人類學分析，以及前現代社會生活的歷史分析。	以行動者為中心，尤其是具有合格施為／代理能力的個人、組織與民族國家。
行動者的性質	農民應該被統治者人道地對待，但鮮少有提出要求的權利。現代性的個人在制度裡有追求合法利益的權利，她／他們或許可以影響菁英，可以有合法的機制去要求正確的權益。	現代行動者被賦予的代理權不僅僅包括追求自身的合法利益，也包括選擇，甚至積極管理社會環境的規則。由於行動者擁有合法的集體權威，所以也必須為高度的集體生活承擔責任。

資料來源：整理自“World Society, Institutional Theories, and the Actor,” by J. W. Meyer, 2010.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6, 2-3.

文化和組織急遽地發展，全球模式的重要性再次顯著地增加，其影響範圍涵蓋了幾乎所有的理性化社會領域——包括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教育領域、醫療體系、學術領域，甚至家庭與宗教領域。全球模式定義並合法化了在地行動者（actors）的目標，如形塑了民族國家（作為行動者）的結構和政策規劃。全球模式所體現出來的目的，如對社會經濟的進步與對公平正義的追求，是高度理性化的、明白表述的且經常是能凝聚高度共識的（Meyer, Boli, Thomas, & Ramirez, 2005: 85）。

這些高度理性化、標準化全球模式的存在，對Meyer而言，也就意味著一個世界文化（world culture）的存在。在此，必須對新制度主義者的文化概念做一必要的補充說明：Meyer等人認為，文化不僅指涉社會的價值環境與知識環境的總合，還包含了社會本身的制度化模式（institutionalized models）。準此而論，文化不僅是社會運作的背景因素，它也定義了社會自

身的意義、價值及其組成。質言之，當文化作為社會的本體時，行動者及其作為、手段與目的，被看作是社會的現實（reality）；當文化展現賦予意義的性質或功能時，它能指引行動者及其作為、手段與目的，從而使行動者及其作為、手段與目的獲得相應的意義和合法性（Meyer, Boli, & Thomas, 2005: 28-29）。進一步來說，經過高度理性考慮而被列入文化的東西，就成為制度，因此制度可以被理解為文化的規則；同時，制度又是文化的累積，是理性行動者及其作為所產出的價值，因此Meyer等人（2005: 17, 46）主張：制度即文化規則；制度化是理所當然地去建立這些規則，同時斷開其他的意義和規則。

三、世界社會與世界政體

Meyer等新制度主義者假定，世界社會運作的基礎是不存在所謂的世界國家（world-state），⁴世界社會的形成與其說是單一中心國家的影響和操弄，毋寧說是始於理性化的文化元素（cultural elements）和組織發展；世界社會中的民族國家和其他主要的行動者（理性化的組織和個體），藉著援引全球模式中普遍有效的規則，去要求自己的主權和權利、互相承認彼此的合法地位，並且互相依賴（Meyer, 2005: 138-139; Meyer et al., 2005: 119）。另一方面，西方理性化概念的工具性和目的性，使得社會被形構為達成集體目的之手段，也就是說，社會是循著人類的理性計畫（nationales Projekt）往進步與正義邁進的。順著這個理性化概念的思考路線，Meyer等人（2005: 34）將適用於世界社會的理性計畫及其進程表述為世界政體（world polity），並且主張世界社會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文化的建構（cultural construction）（Meyer, 2005: 139）。

單從上述關於新制度主義者對於世界社會、世界政體及世界文化的主張，不容易彰顯出其理論價值，目前為止，Meyer的論述看似只是將社會、

⁴ 世界社會上唯一的霸權國家或中心國家。

政體、文化等概念放大到全球的層次，並且在世界社會中，突出民族國家這個最具規模和影響力的行動者。關於Meyer新制度主義的理論價值和較深層的意涵，還要藉其所比較、批判、部分吸收和（或許）超越的幾種社會學理論取向去凸顯——尤其是這些理論取向對民族國家和（世界）文化等概念的認知立場和主張。

四、從與不同理論取向的對話中確立Meyer新制度主義的基本立場

首先須留意的是，Meyer新制度主義的類型學與國內（政治學或國際事務領域）已較為熟知的新制度主義三分論不盡相同，後者基於對古典（舊）制度主義的反省與批判，發展出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及社會學制度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等三個主要理論取向（李英明，2005：2-20；Hall & Taylor, 1996）；而Meyer則是透過吸收與折衷所謂的「微觀現實主義」（microrealism）、「鉅觀現實主義」（macrorealism）及「微觀現象學的研究取向」（micro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等三種新制度主義的理論取向，確立其社會學新制度主義。上述兩者的類型學與論述理路都不盡相同，為能兼顧提供全球化機制的材料，以下討論以Meyer的四分解釋模型在民族國家層次上的展開為主。⁵

（一）微觀現實主義與鉅觀現實主義的取向

微觀現實主義在目前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us）的旗幟下，主宰了有關國際關係的理論。Meyer認為在微觀現實主義的理論裡，民族國家存在於一個本質上是無政府的世界中，國家的行動是導向自身內在的需求和利益，作為行動者的國家及其行動被視為是理性、帶有目的和理所當然的。人們經

⁵ 後來Meyer（2010：3-4）也發展出一個簡化版本的解釋模型，以現實主義和現象學取向為兩端的連續光譜，來說明其新制度主義在光譜上（傾向現象學取向）的位置。

常是在爲了去說明根植於歷史的特殊行爲模式時，才偶爾提到文化，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無關緊要的。簡言之，文化只是在地的、國家的，而不是全球的。在這層意義上，許多關於全球化的文獻是微觀現實主義取向的，世界社會對於自主的國家行動者而言，更像是一個交易頻繁的外部網絡。這個理論取向的變體，如Robert O. Keohane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和Stephan D. Krasner的國際建制理論（Theorie internationaler Regime），關注國家所建制度的框架條件，以及其在國際上對國家行動的影響，但此等制度的形成和存續又需要微觀經濟學和現實主義的論述去解釋自身，也就是說，服膺這些理論的國家想把自己的制度拿到國際上實施，但是制度的合法性又受到它們的侷限。如此一來不得不令人質疑：源自自己國家的需求與利益所形成的論述與制度，爲何要求國際配合？在那樣的論述與制度裡，國家的權力和利益顯然具有優先性（Meyer et al., 2005: 88）。

鉅觀現實主義的興起部分出自於對微觀現實主義的反動。在鉅觀現實主義者的理論中，如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和Charles Tilly關於國家競爭的論述，民族國家是嵌入在世界性的經濟或政治的利益結構、交換關係和競爭關係中的。國家與其說是一個受到那些結構限制的行動者，毋寧說它從全球經濟、政治與軍事的競爭中表明了自身的立場，並展現出自身獨特的樣貌；又如在資源互賴的相關論述中，現代組織也是透過國家和經濟霸權去建立起來的。在這個取向的理論中，金錢、力量、權力和利益才能夠驅動全球性的變遷，Meyer認爲世界體系理論已經指出，世界經濟和國家系統的動態變化，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賴於全球單一核心權力的缺無，即世界國家或世界帝國的缺無。至於文化則是以霸權秩序的意識型態之姿出現，但由於文化與核心利益關係不大，也不足以驅動全球性的變遷，它在本質上是霸權秩序的副產品，所以沒有必然的重要性。換言之，文化主要被行動者用來表達他們基於權力和利益而設定的認同和目標，因此更像是被單方面和片面給定的社會現實（Meyer, 2005: 135-136; Meyer et al., 2005: 88-89）。

表2 微觀和鉅觀現實主義對「世界」與「文化」的觀點比較

概念	微觀現實主義的觀點	鉅觀現實主義的觀點
世界	是無政府的：行動者在沒有上位權威的干擾之下去追求利益，世界僅是國家與在地層次的既得利益行動者所構成。	是網絡的：行動者有意地建構一個在經濟或政治的競爭上互相依賴的體系。
文化	功能性的角度：文化是整合集體的表現材料。	功能性的角度：能支持強大行動者的宰制。全球宰制結構的擴張和改變，意味著相應的文化規則的擴張和改變，而宰制者總是能獲取好處。

資料來源：整理自“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by J. W. Meyer, J. Boli, G. M. Thomas, & F. O. Ramirez, 1997.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 148-149.

在現實主義的全球化論述中，行動者之間所發生的互相學習和仿效的複製現象（copying）似乎只是基於功能需求、競爭壓力或宰制關係而形成的互相依賴或壓迫，現實主義者及其指涉的行動者在一定的程度上忽視了文化在整個過程中的重要性（Meyer, Boli, Thomas, & Ramirez, 1997）。可見，Meyer的社會學制度主義並不完全否定現實主義的社會與制度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並且也從中獲得論述無單一中心國家之世界社會的養分，惟對既有的社會現實受到世界文化影響的層面欲予以正視，俾提供更有解釋力的理論模型。

(二)微觀現象學與鉅觀現象學的取向

微觀現象學的取向主張行動者被嵌入在某種自己（包含組織與國家層次）所產生的制度化文化裡：行動者重視文化的意義建構和對文化的認知，國家被看作是在詮釋文化的過程中所形成的產物，並且被牢牢地嵌入具有文化特色的制度裡。但是，那些制度經常無法充分反映出全球模式及其進程，也無法擴張為全球化性質的模式，也就是說，微觀現象學的研究取向關注文化及其詮釋，但該理論取向中所指涉的行動者，將自身的行動進程侷限在在地或國家的層次，並倚靠著在地的知識和事實，築起一道文化的疆界。微觀

現象學取向沒考慮到，在地行動者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世界文化影響，或說，在地行動者的許多部分也是被世界文化所建構的，現代行動者的認同和詮釋模型，有許多都直接來自疆界外部的意義系統，以至於在地的條件只能決定行動者結構的一小部分（Meyer et al., 2005: 89-91, 114）。雖然微觀現象學取向的「文化」經常只在難以普遍化的表達中被理解，但在地文化的一些成分還是具有學術與專業的元素或特徵，這正是Meyer從微觀現象學取向的論述裡所得到的啟發（Meyer, 2005: 134）。

社會學的新制度主義者在197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吸收和整合了前述不同取向的理論論述，並且進行了一些大規模的實證研究，從而確認了「鉅觀現象學取向」（macro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的基本立場：文化不是單從在地的現況和歷史中形成的，它是在全球的層次上被學術與專業組織起來的，它能在世界社會裡被展現出來、它佔有且能賦予世界社會實質意義；此等超國家的力量在過去的西方世界裡一直運作著，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些世界社會的特徵和進程對民族國家的發展再次產生大幅的影響（Meyer, 2005: 135-136; Meyer et al., 2005: 89-90）。值得注意的是，Meyer等人指出，在大部分社會學理論關於現代社會進程和制度形式的論述中，行動者及其作為被視為是既定的和現實的，相對地，新制度主義者則視行動者的存在和特徵為社會建構的，因此有繼續去追問和探究以行動者為中心（actor-centered）的制度主義的空間與價值。質言之，行動者的行動，包含其動機、決定與目的，不完全是內在發生的，也不是完全自主的，依照新制度主義者的理解，行動意指在不受疆界限制的情況下，上演制度的分鏡劇本（action as the enactment of broad institutional scripts）（Meyer, 2010: 3; Meyer et al., 2005: 19）。因此，要理解新制度主義觀點的全球化機制，還必須認識使全球模式或世界政體運作的社會單元——即現代行動者（modern actors）和理性化他者（rationalized others）——在世界社會或世界文化中具有何種性質，以及扮演何種角色。

五、現代行動者及理性化他者

社會學的新制度主義者主張，行動者的旨趣和利益是被普遍化地定義出來的，他們（它們）有權利去追求利益，同時也有義務去宣揚其旨趣；行動者互相地合法化彼此，並且從實踐世界文化各種全球模式的過程中，去獲得集體的權威（Meyer et al., 2005: 121）。準此而論，行動者及其作為之間具有同義反覆的因果關係：行動已經包含在行動者的社會定義之中（Meyer et al., 2005: 31）。Meyer主張，世界社會的現代行動者主要有三種型態，⁶第一種型態是現代的個體（modern individuals），他們吸收了個人、公民和人類所建構出來的認同，並從高度標準化的思想和理念中，獲得自身的權利與義務（Meyer, 2005: 137）。人類精神與靈性的權利與義務，在西方思想的發展史中本來可以追溯到主動干預一切的神，現在這些權利與義務落到了人本身及其社群上頭來，即個體自己設定行為之目的且負有責任。準此而論，個體就是合法的行動者，他們可以成為自己和他人行動的代理人、可以成為被其他行動者動用去支持其行動的資源，因為他們在定義自身時就援引並依賴了世界文化、因為他們的行動導向理性化的進程。由於個體的本體狀態是社會建構的，所以他們就像是依照標準化分鏡劇本去登臺演出的演員（enactors of scripts）（Meyer et al., 2005: 94, 121）。

現代行動者的第二種型態是現代的組織（modern organizations）。現代組織首先在符合自然法和道德法的公理預設和學術中找到自己的社會定位，所以也可以說是各種標準化社會理論的產物（Meyer, 2005: 137）。許多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有從事社會運動的特徵，它們是世界文化的捍衛者，它們爭取人權、對消費者的保障、環境保護、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人類的公平正義等。它們經常視自己的行動為草根式的反對運動，並在執行世界文化的原

⁶ 其他的社會單元型態，如部落（部族）、氏族（宗族）、家庭（家族）、族裔（種族）、團契（社區）等，則非世界社會的主要行動者（Meyer, 2005: 133）。

理原則的過程中，譴責所看到的在地缺陷與弊端，同時向國家或其他行動者要求正當的行動。現代組織是社會問題的發聲者，它們促進了理性化系統的結構擴張（Meyer et al., 2005: 115-116）。⁷

現代行動者的第三種型態，也是最重要的一種型態，就是現代的民族國家（modern national-states）。它們首先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其中個別國家的主權和疆界是透過外部的合法性被給定的（起初是宗教和法律的合法性，現在更多是公理和學術的合法性），國家發展的適切目標是追求進步與正義，進步在今天大致上被定義為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的增加；正義在今天的許多時候被理解為追求平等，這些目標都是來自於世界文化的定義和評價規則（Meyer, 2005: 137）。在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裡，如果有一個政權或體制硬拗地拒絕全球模式，在地的行動者可以藉著援引合法的概念（民主、自由、平等）和獲得外部活躍團體的支持，去對該政權發出異議。民族國家的重大決定甚少偏離世界文化，因為不論是民族國家內部的自主決定，還是受到世界社會的壓力和影響之後所促成的決定，其決策內涵都是源自相同的、具有支配力的各種制度（Meyer et al., 2005: 108）。

由上述可知，個體、組織與民族國家等現代行動者即全球模式的執行者，那麼，所謂的全球模式又是怎樣被建構出來的呢？Meyer把世界文化、世界政體和世界社會的形成，大大地歸功於「理性化的他者」，顯然，理性化他者這個術語指涉理性化和他者兩個概念。首先，Meyer借用Max Weber的理性化概念去發展它在新制度主義裡的使用，簡言之，理性化在此被理解為工具性的，它導向帶有目的之行動，它是日常生活的結構化，能產出標準化的、非個人的規則，並且這些規則的功能是把社會秩序向著集體之目的看齊（Meyer et al., 2005: 33）；其次，他者的概念則是引申自George H. Mead的「概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Werron & Holzer, 2009）。綜合上

⁷ 關於理性化系統的結構擴張，在後文探究新制度主義者的全球化機制時，則以民族國家的發展為例再次提及。

述兩個概念，世界社會裡的理性化他者，在最高層次的意義上指的就是學者和專家（*scientists and professionals*）。十九世紀以來，自然科學領域的他者建立了以普遍術語分析自然世界的原理原則，到了二十世紀的後半葉，社會世界的原理原則也被建立起來——社會科學領域的他者聲稱，能作為顧問地給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提供（純粹當地文化之外的）建言。他們相對無私地發展自身成為重要的、有聲望的世界社會參與者，他們不是因為自身是強大的行動者，所以擁有權威，他們的權威建基在假定為普遍的、理性的、終極有效的道德法則和自然法則之上；他們研發理性化、科學化（*scientization*）和普遍化的知識，並藉此去指引行動者及其作為，因此，理性化他者鮮少被視為是行動者，他們大多根據自己的技能為現代行動者貢獻建言和目標（*Meyer, 2010: 7-8; Meyer et al., 2005: 111, 117-11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廣義的顧問及顧問機構是最時興、最廣義的他者，如治療師、教師、訓練員、律師等，如果沒有這些他者，我們很難期待個人、團體或國家能成長為合格的行動者。此外，一些現代行動者經常會以「他者」自居，如致力於促進人權的組織能表現出普世的德行、無私地去協助名義上的對手；當民族國家以他者自居時，也能夠為世界社會提供發展模式，如瑞典的福利國模式、美國或紐西蘭的自由主義等。接受了「他者位格」（*otherhood*）的民族國家行動者已不太可能提供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殖民主義般全然自私的發展模式了（*Meyer, 2010: 7*）。

準此而論，世界文化即是現代行動者與理性化他者（兩者的異同請參見表3）透過有形和無形的合作所長期累積出來的成果；世界政體，與其說是由行動者組織起來的結構，不如說是由作為顧問的理性化他者所組織起來的結構；世界社會不僅由行動者所組成，為行動者的行動提出理性化與合法化建言的學者專家，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夥伴；行動者藉由執行理性化他者所參與或代言的全球模式，去滿足需要和追求利益，如此一來，行動者的行動既是合乎理性的、也是具備合法性的（*Meyer, 2005: 142*）。目前為止，新制度主義觀點下的全球化意涵可以表述如後：世界政體的內涵是由具備世

表3 現代行動者與理性化他者的異同比較

現代行動者	理性化他者
應當追求利益	應該對利益不感興趣（一個透過實施自己的建議而獲利太多的經濟顧問，會失去他的公信力）
要留意定義自身的迷思，避免成為從個人利益出發的行動者、從而落入現實主義的理論窠臼：民族國家的行動者甚至會企圖成為霸權國家	理性他者（如經濟學專家）是定義寬鬆的個體或社群
應該具備明確可運用的資源	未必具備明確可運用的資源
必須具備可資運用的組織，並以理性與合法的手段去達成目的	未必有可運用的組織
有特定的形象	可以基於貢獻世界文化的理由融入某些特定的形象（如出任學術審查委員或在某時期成為國際組織正式或非正式的一員）

資料來源：整理自“Der sich wandelnde kulturelle Gehalt des Nationalstaats,” by J. W. Meyer, 2005. In G. Krücken (Ed.), B. Kuchler (Trans.), *Wie die westlichen Prinzipien die Welt durchdringen* (pp. 142-143). Frankfurt, Germany: Suhrkamp.

界文化素養的理性化他者（作為顧問）去發展起來的；現代行動者的任務是組織全球化的進程和執行世界政體。世界政體作為一種規劃的藍圖，可以表述為靜態的世界文化。作為一種動態的進程，它指涉一種全球化的機制或全球化滲透的方式，在這進程中，行動者是被理性化地嵌入的，同時他們的行動也是彰顯理性化的過程。

六、Meyer新制度主義中的全球化機制

Meyer等新制度主義者在建構及展開他們的理論論述時，曾進行一個社會哲學式的思想實驗（Gedankenexperiment），這個思想實驗比較具體地描述了全球化的主要對象及其歷程，從而有助於理解他們的新制度主義為世界社會設想的全球化機制。實驗的起點始於一個問題：「假定在一個到目前為止不為人知的島嶼上，一個不為人知的社會被發現了，那麼接下來，這個島

嶼社會將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呢？」首先，可能是由來自外部的經濟學家拿出他們的專業知識和工具，（讓人）去分析島嶼的經濟狀況：由於人們可以倚靠專家的權威和強大的解釋模型，專家甚至不用親自踏上島嶼半步；在一些標準化的資料和圖表的幫助下，人們就可以針對島嶼社會的發展所必要的措施給出初步的建議。同時，社會學家以他的學識和工具去測量和檢驗島上的狀況，如性別不平等的狀況等。在學者專家們的努力下，漸漸地，島嶼社會可以依照不同的經濟學、社會學和其他領域的指標被分類，並且能被拿去跟其他民族國家的社會做比較。這個資訊蒐集和比較的過程可望提升島嶼社會的文化狀況，並強化此一文化狀況在民族國家社群裡的歸屬感，從而島嶼社會能夠快速地轉型為一個「真正」的國家實體（a “real” national entity）。島上的住民會被宣告為擁有普世權利的公民，島上的兒童、長者及窮人則會受到特別的保障；接著會發展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模式和行動，如鑑別經濟生產的低效率、譴責傷害人權的事情，歧視的標準化形式（如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同樣會受到揭露和譴責；國家的人民組成會依據世界通用的人口普查模式去統計和分類；現代的法律制度會在教育、醫療、學術、家庭等領域發展起來。以上這些事情都是眾所皆知的，要做的只是去付諸實施而已（參見圖1）（Meyer et al., 2005: 86, 93, 95）。

島嶼社會的政府能支配許多部門、機構和組織，它看起來大概就是一個現代國家的樣子，然後它會被其他國家正式地承認並加入聯合國，這個社會會被視為一個經濟體，它在國內和國際的貿易上有著標準化的資料庫、組織和政策。所有這些在今天這個思想實驗中的島嶼社會上，都會以更快的速度發生，並且全球模式會更高度地滲透到島嶼社會的日常生活裡。此外，世界社會的組織也是島民的顧問，這些現代組織自認肩負的任務是啓蒙島民全球模式的重要性和效用，也就是說，島嶼社會在全球框架下，會和聯合國及各種非政府組織聯繫起來進行標準化。即使不去認識這個迄今不為人知的社會歷史、文化、風俗和傳統，我們似乎也能夠預言它的變遷：這座島嶼在被「發現」之後，將會被「發展」所襲捲。而只有少數人會認為，只要給予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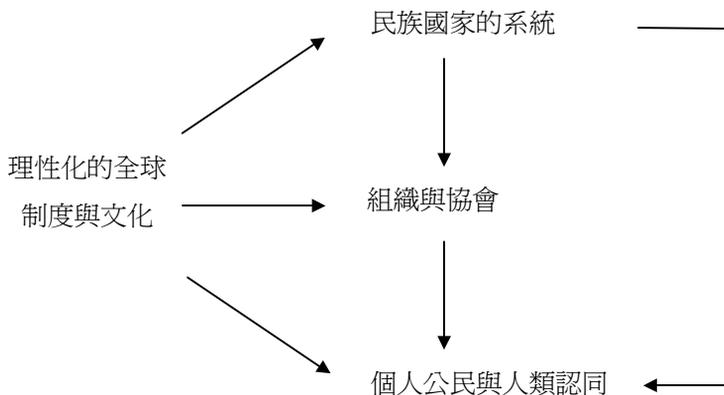


圖1 世界文化由上而下地滲透至行動者

資料來源：修改自“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by J. W. Meyer, J. Boli, G. M. Thomas, & F. O. Ramirez, 1997.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 151.

地人適度的人權和公民權就足夠了，最好是只要幾年的職業訓練，對他們的教育而言也就足夠了（Meyer et al., 2005: 86-87, 113）。

思想實驗進行到這裡，可以看到Meyer等人的新制度主義強調世界社會中行動者（民族國家）發展的相似性部分，並試圖闡釋，島嶼社會的發展儘管由於在地的經濟條件、權力關係和文化傳統，而存在無數種可能的形勢，但是這個社會仍然迅速地向標準化的模式看齊，並且在短期內與其他一百多個民族國家互相近似。這種由於參照世界文化與全球模式去發展，從而在世界社會中所產生的種種相互近似⁸——在本質上不同於別的理論取向所指涉的相互仿效與複製——Meyer稱之為同構（isomorphic）現象。⁹無論是微觀

⁸ 新制度主義者對全球化（民族國家發展的進程和結果趨於互相近似）提出的解釋，即與現實主義所產生的解釋有了區別：現實主義指涉的全球化，更多是指國家之間互相複製（copy）對自身有利的結構而言。

⁹ 在經驗上可以確認為同構的例子包括：憲法、依照標準化課程實施的學校教育、關於經濟發展和人口成長的標準化資料蒐集、官方的男女平權措施、全面且普遍地落實人權、環境保護措施、擬訂提升人均GDP的經濟政

或鉅觀的現實主義、還是微觀現象學的研究取向，都無法對假想島嶼在社會上和組織上的變遷做出上述的預測，因為它們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忽略了伴隨在變遷裡頭的世界文化進程。全球模式的權威，儘管不具強制力，仍是解釋島嶼社會在世界社會中能夠快速接受現代結構及其目的主要理由（Meyer, 2005: 148-150; Meyer et al., 2005: 85, 91, 96, 104）。

島嶼社會在與世界社會的其他民族國家取得結構上的近似之後，會如何繼續發展呢？Meyer繼續延伸他的思想實驗：島嶼社會將擬定一部相當先進成熟的憲法，並推動官方的社會與經濟計畫，但是對於一個缺乏足夠標準化資源的社會而言，比起在實踐上真正去轉化全球模式，單單去接受時興的各種世界文化還比較容易——比起蓋學校和成立社會機構，政府部門去成立一個發布擴張教育制度或保障婦女權利的聲明，是相對容易的；比起去找到所需要的資本、技術和受過訓練的標準化人力，僅僅去擬定一個經濟發展計畫是相對容易的——也就是說，理性化模式的理想經常無法妥善地落實。質言之，行動者運作的邏輯是去引進外部所定義的認同，所以初步去進行形式上與實質上的同構時，會由於軟硬體資源的不同與落差，無法與標準化（某種程度上也是理想化）的全球模式取得完全一致，Meyer指稱這樣的情況為脫鉤（decoupling）現象。在經歷「同構」與「脫鉤」的發展過程之後，可以預測的是，島嶼社會將會持續援引外部模式，從而提出新一輪的計畫和草案，即使有人會對這樣的決策抱持嘲諷的態度，但島嶼社會主要的後續發展還是會繼續增加各種計畫和改革。此外，為了使源自外部的認同在島嶼社會

策、對疾病的標準化定義和醫療照顧等。再以女性參與高等教育為例：微觀現實主義者認為，已開發國家的女大學生數量增加得比其他國家來得快；鉅觀現實主義者認為女大生數量增加的速度，在中心大過於邊陲；微觀現象學者則會認為，在西方國家的女大生數量持續增加，而同樣的情況在伊斯蘭國家卻是難以想像的。事實上不管在哪，大約是在同一個時期，都發生了女大學生數量大幅增加的現象。也就是說，在某個時期內，世界社會裡的主要行動者都認為，男女平權的議題是重要的。上述基於實證研究的發現，能夠說明有一些涵蓋全球範圍的力量在發揮著作用，它促使同構現象的發生（Meyer, 2005: 149-150; Meyer et al., 2005: 96-97）。

中獲得正當性，島嶼社會將會學習自主地執行世界文化的進程，它會建立如綠黨、婦女團體、消費者保護協會等組織，Meyer將這些過程稱之為擴張地結構化（expansive structuration）。質言之，結構的擴張不僅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求和發展，同時也是以同構地變遷（isomorphic change）為目的。接下來，島嶼社會將會去揭露一連串的社會問題，並進行相關的基礎研究等。看似世界文化給島嶼社會製造（定義）許多社會問題，然而那些問題將促使（在地）理論的生產（Meyer, 2005: 156; Meyer et al., 2005: 99-102, 115-116），那些問題不僅是在地文化持續成長的契機，也可能是豐富世界文化的契機——只要那些從在地發展出來的理論能貢獻學術與專業、能貢獻世界社會。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Meyer觀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局勢，一方面凌駕民族國家之上的強權國家（supranational state）或國家間的強力結盟沒有（繼續）發生；另一方面，全球化的過程則是戲劇性地擴張起來，可見相對弱化的跨政府聯合（weak intergovernmental associations），如Alexis de Tocqueville曾經描繪過的既聯合又去國家性的美國，或是後來發展起來的歐盟，似乎是目前最佳的想像共同體（Meyer, 2010: 6, 11），它們除了表現出無單一中心國家的事實之外，也表現出世界社會有如同Held、McGrew、Goldblatt與Perraton（1999: 16）全球化論述所指出的區域化現象（regionalization）。

透過上述思想實驗所設想的島嶼社會及其發展情況，以及前述Meyer理論的主要概念，其新制度主義所蘊含的一種全球化機制，或許就可以表述如後：（一）學者或專家作為理性化他者，在世界社會的各個層面和領域貢獻知識，從而豐富了世界文化；（二）理性化他者依據世界文化和自身的學術與專業，為世界社會去設想其世界政體；（三）民族國家、組織和個體在上述各個層面上進行了某種程度的理性化和標準化，從而成為世界社會的主要行動者；（四）行動者在理性化他者的支持下，上演各種全球模式的分鏡劇本，從而世界社會的各個民族國家的發展，對照於世界文化與各式各樣的全球模

式，有著「同構」的現象，並且可能促成鄰近民族國家的「區域化」；(五)由於各民族國家可運用的資源及個別情況不同，無可避免地出現與世界文化或各種全球模式「脫鉤」的現象；(六)行動者（尤其是民族國家）依據變遷中的世界社會、世界文化和增修後的世界政體，提出各種發展和改革的計畫，從而表現出多樣化、在各自結構上的擴張；(七)透過外部模式的檢驗所定義出來的問題，將由相關領域的學者和專家著手處理、發展理論解釋和解決方案。特別要強調的是：在地的學者專家首當其衝且應該當仁不讓地去接下任務或挑戰，他們能對問題形成理論論述或提供在地行動者解決方案，並且有機會去貢獻世界文化的內涵。

參、Meyer新制度主義對臺灣教育與文化研究的啟示

一、全球模式的範疇包含教育領域

假如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民族國家中教育領域的發展，會發現現代教育是在國家的層次上被正式組織起來和控制的，特定的國家需要和利益會決定教育的型態或種類。由於國家被視為是有疆界的社會文化系統，從而教育就被整合在這個系統中，又因為國家高度被經濟、政治與文化所決定，所以教育制度也必然在相關的考量下被決定，即使有一個標準化的進程正在進行，教育的發展也會逐漸被經濟與政治的整合所決定，不論是在微觀的在地層次上或在鉅觀的全球層次上皆然。如果從微觀現象學的觀點來看民族國家中教育領域的發展，也會落入類似現實主義觀點的問題，因為微觀現象學傾向於認為：不同的社會或菁英需要不同的人員為其提供服務，所以他們會根據自己的需求、透過教育來培育或社會化下一代；左派的論述則會以揭露階級宰制和菁英意識型態，作為發出異議的重點。然而在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國家的教育，不僅存在著同構發展的現象，在標準化的速度上，也不亞於其他領域（經濟領域或政治領域等）的全球整合模式和進程，並且

教育模式的傳播，愈來愈少直接從中心國家傳遞到邊陲國家，同時愈來愈多透過國際組織、學術與專業滲透到各國（Meyer & Ramirez, 2005: 212-214, 221），如歐洲高等教育區的成形、波隆納進程的持續擴張等（周華琪，2014）。

由上述可知，在全球模式的意義上，教育領域相對於政治、經濟或其他標準化的領域，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其相對自主的發展模式。易言之，教育領域的全球模式，依照Meyer等新制度主義者的觀點來看，並不附庸在其他領域的全球模式之下，教育領域乃直接從屬於世界社會全球模式的範疇，從而教育的全球制度化能突顯自身為重要且必須去研究的動態過程。因此，臺灣的教育研究能否在新制度主義的意義上，與世界社會的特定部分形成確切的連結？它能否透過長期的縱貫研究，詳實地描述和提供教育全球化的歷史研究（Chen, 2015）或實證研究的成果？這些在地問題的探究都會有助於理解世界社會變遷的歷史與進程。

二、臺灣面對世界文化所抱持的可能態度

社會學的新制度主義能在現實主義取向和微觀現象學取向之外，對全球化的進程提供一些獨到的解釋，而這幾種不同取向的研究和理論觀點，恰可讓人從中勾勒出臺灣面對「世界文化」時，可能遭遇的處境或可能抱持的態度，並且這些處境或態度有著本質上的差異，以下試詮釋之。第一種態度是，把世界文化當作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的形式，或者說，不認為存在所謂的、真正的世界文化，而認為真實存在國際社會上的，是某種（西方）文化霸權的壓迫，並且這種政治或經濟上的壓迫是絕對強勢的、非理性的、未必符合道德法原理的，準此而論，國家的發展，包含教育與文化的走向，受到決定性的擺布。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治臺灣的教育與文化的發展狀況（林詠梅譯，2000）就相當具有代表性，且直至今日仍存在尚未充分處

理的議題。¹⁰

與第一種態度相近又有所不同的第二種態度則是：雖然認為中心國家會宰制邊陲國家的發展，但此所謂的宰制實際上不完全來自中心國家的決定，而是部分來自邊陲國家的自我殖民化。易言之，第二種態度看到歐美文化相對強勢的一面，同時又視自身的文化和傳統為次等文化，所以要全盤地、不遺餘力地接受西方知識，西方知識在這裡成爲一種廣義的世界觀（一種聲稱永遠占有充分優勢的意識型態）。¹¹舉例言之，臺灣社會對於英語學習及歐美節慶文化的狂熱（廖柏森，2004），或是臺灣的教育研究在貢獻原創的現代教育思想方面之匱乏（陳灤翔，2011）等。

不論是文化帝國主義或世界體系理論，不論是被動受到霸權力量的壓迫或在中心與邊陲的體系下主動迎合「大勢所趨」，臺灣文化的發展，¹²如立基於上述這兩種態度之上，在本地將無法受到足夠的重視，從而面臨更加嚴峻的危機——在地的學術研究與專業發展將更少地能夠成爲在地價值的泉源，遑論能提供世界文化或教育的全球化什麼樣的正向回饋了。

第三種態度是，致力發展特色的在地文化：一方面企圖以在地的文化特色來獲得內部的集體認同；另一方面藉著文化差異來區別外部文化。這種微

¹⁰ 例如女性人權意義上的慰安婦議題。

¹¹ 原本世界觀學說（weltanschauliche Lehre）的特徵是把一種特定的宗教教義或一種由特定學科（例如社會哲學、政治哲學）之特定取向所得的研究成果，做出「超歷史」的詮釋。一方面這類理論信仰自己所指出的歷史進程是唯一正確的，或自詡為最兼容並蓄和最優越的理論；另一方面它們也經常兼有「超國家」的性質，試圖對其他國家或區域造成專斷的影響，因此世界觀學說對其他的理論和研究都產生一定程度的排擠效應（Chen, 2015: 144; Koerrenz & Winkler, 2013: 43）。

¹² 臺灣的文化無疑地來自多元的傳統，是原住民文化、中華文化、歐美文化、日本文化及部分東南亞文化的鬆散結合或想像共同體。如果在提問「臺灣文化面對世界文化時應扮演何種角色」之前，應該先回答「中華文化在臺灣文化中扮演何種角色」的話，一種簡短的回應或許可以是：中華文化（包含傳統儒家文化及新儒家思想等）之於臺灣和其他曾受影響的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及南亞國家（如越南），粗糙地說，猶如希臘文化之於大部分的歐美國家（如德國、法國、英國和美國等）。

觀現象學取向的思維不容易與世界文化進行充分且有效的交流，易言之，這種態度不僅忽視了標準化全球模式的滲透能力，也忽略了學術與專業之目的是在於透過理性化的過程，讓知識在世界文化與社會中獲得普遍有效的合法性，而正是這種具有學術與專業權威的知識，有融入世界文化和全球模式的機會，從而能夠發揮強大的影響力。有些在地文化當然會因為它的獨特性，或多或少地受到世界社會的關注，然而，倘若無法在在地文化中找到在學術與專業上可以被普遍承認的成份或元素，要貢獻世界文化似乎還有一段距離。因此致力發展在地文化的態度，一方面對世界文化的理解不夠深刻，另一方面對於以學術和專業去貢獻世界文化的機會也比較欠缺把握，似乎顯得用力不足，甚或興趣缺缺，如此一來，還可能白白讓渡一部分對自身文化與傳統（思想）的解釋權，舉例言之，如果臺灣對自身的歷史（或教育）思想史的發展還沒能提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要如何能在專業的（學術）場合中，向世界社會的他者或行動者分享既是在地、或許也屬於全球的知識呢？

面對世界文化的第四種態度是「上演標準化的分鏡劇本」：世界文化與全球化有形或無形地滲透進來，作為理性化他者的學者專家，相對有意識地積極參與和引進各種理論上與實務上的全球模式、尤其是源自先進國家、歐盟或北美的全球模式。抱持這種態度的行動者在Meyer新制度主義的角度看來，是夠格的標準化行動者；然而，在地文化雖然也被意識到，但同時又是處在一個從屬於世界文化的地位，並且可能有進一步被邊緣化的隱憂。這種態度或許沒有正視到一個事實：大部分的現代世界文化及許多全球模式，一開始經常是為了定義與解釋世界社會上某個區域或組織的問題或單一先進國家的在地問題，從而發展出相應的理論和解釋模型，然而，由於嚴謹的理性化和科學化的過程，那些成形的理論或知識不僅被學者專家所普遍承認，並且可能進一步成為眼前的、所謂的標準化全球模式。倘若臺灣不斷引進和上演全球模式的分鏡劇本，並且持續中度或高度地落入「同構—脫鉤—一再同構」的循環，而鮮少以進入有意義的結構擴張和實質解決問題等階段為目標

的話，那麼，即使在同構與結構擴張的過程中，臺灣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會隨著世界文化的變遷而變遷，但要更實質參與而非附庸於世界社會，則仍須尋求突破。臺灣的社會科學研究在貢獻普遍知識的方面，顯然有待努力。

第五種態度可以被視為對前述四種態度或處境的綜合反省——試圖主動去豐富世界文化或實質參與世界社會：一方面現代行動者，包含國家、在地組織和公民，要通過各種層次、各式各樣的全球模式去實質參與世界社會，從而爭取認同；另一方面，在地的理性化他者在接受與轉化全球模式的同時，也致力於發掘和發揚自身的傳統和文化，或致力於解決被世界文化所定義出來的問題——他們在試圖解決理論上或實務上的在地問題的同時，也企圖找到某些可以被理性化，進而有機會被世界社會的學者專家所接受和承認的文化元素或學理知識。反過來說，解決社會問題及對在地的歷史、文化與認同，在學術與專業的層次上進行持續不斷的詮釋、建構或重建，這本身就是一個理性化與科學化的過程。持續去進行這樣的結構擴張，也會相對地不容易落入自我否定，進而自我殖民的態度，從而能進入一個更好的循環（如進入符應Meyer新制度主義指涉的全球化機制的循環），相關的參與者也相對有機會成為合格的標準化行動者或理性化他者，進而在名義上與實質上都真正成為世界社會的一份子。再舉例言之，臺灣高等教育機構自1960年代中期以來的擴張（湯志民，2003），以及大學生自2016學年度起將逐年減少的情況（黃榮村，2015），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全球高等教育的同構現象，在地的學者專家乃至於相關的政府部門，即負有提出適切的解釋模型乃至於因應對策的職責，這同樣是一個貢獻普遍知識和全球模式的契機。

肆、結語

臺灣文化在世界文化中能扮演何種角色？從Meyer新制度主義的角度來看，首先要問的或許是：什麼樣的文化才是世界社會所看見和認定的臺灣文化？或者更為展開的說法是：學者專家能提出什麼樣的文化元素或知識內

容，並讓這些文化元素和知識內容，能被世界社會的學術社群與專業社群承認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以教育學術專業領域為例，假如在地的理性他者的功能僅是協助行動者從世界文化中不斷引入教育領域的全球模式，並善盡代言與辯護之責，但卻無法充分紓解在地社會的教育爭議，也無法提出能充分受到國際教育學界注意的回饋，即停留在「同構—脫鉤—再同構」的循環裡（甚至停留在現實主義脈絡下的某種「複製」循環），那麼，臺灣的教育研究，不論是教育改革研究或教育基礎理論研究，即不論是實務面向或理論面向，顯然皆仍未在國際上獲得可觀的成就與承認。如果流連徘徊於這樣的處境，當然就難以去談論「臺灣的教育與文化能夠在世界文化中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了。

本研究藉由探究Meyer新制度主義的理論基礎，指出世界社會全球模式的範疇包含教育領域，因此臺灣面對世界文化時應體認它的存在並積極參與其全球化進程，如教育研究能理性化與科學化地重視歷史研究、分析和解釋長期（實徵）研究的成果，或者能去發掘和爬梳過去在文化、教育和思想方面的累積和成就，並試圖加以詮釋和重建等，應該都可以豐富臺灣的文教內涵和促進其貢獻世界文化的機會。尤其在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的意義上，當學者專家在其學術與專業領域之中發展出充分理性化的論述，或是能指出世界文化可資改善的內容並且積極提出回饋時，即是掌握了「在地全球化」的契機和過程。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林詠梅（譯）（2000）。林茂生著。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方。臺北市：新自然主義。

李英明（2005）。新制度主義與社會資本。臺北市：揚智文化。

周華琪（2014）。波隆納進程的新階段：邁向波隆納2020年。高教評鑑與發展，8（1），143-173。

徐超聖（2004）。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社會學分析——世界體系制度主義的觀點。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學報，17（1），1-26。

黃榮村（2015）。高教在壓力下的轉型與評鑑。評鑑雙月刊，54，6-7。

陳灤翔（2011）。從德國精神科學教育學到批判教育學的傳承展望臺灣教育哲學研究。市北教育學刊，40，193-214。

湯志民（2003，10月）。臺灣高等教育擴張與整併之探析。載於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主編），「卓越與效能—21世紀兩岸高等教育發展前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與研討實錄（頁283-330）。臺北市：編者。

蔡德馨（2005）。John W. Meyer世界制度主義課程理論之研究及其在教育上的意義。國立嘉義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市。

廖柏森（2004）。從後殖民主義觀點看臺灣學習英語的熱潮。2016年6月20日，取自http://posenliao.idv.tw/page/page_5_013.htm

(二)英文部分

Chen, L. X. (2015). *Die Rezeption und Entwicklung der westlichen bzw. deutschen Pädagogik in Taiwan — Sichtweisen der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n Pädagogik und der Kritischen Erziehungswissenschaf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Jena, Germany.

Hall, P. A., & Taylor, R. C. R. (1996).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44, 936-957.
- Held, D., McGrew, A., Goldblatt, D., & Perraton, J.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ch, S., & Schemmann, M. (2009). Neo-Institutionalismus und Erziehungswissenschaft – Eine einleitende Verhältnisbestimmung. In S. Koch & M. Schemmann (Eds.), *Neo-Institutionalismus in d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 Grundlegende Texte und empirische Studien* (pp. 7-18). Wiesbaden, Germany: VS-Verlag.
- Koerrenz, R., & Winkler, M. (2013). *Pädagogik: Eine Einführung in Stichworten*. Paderborn, Germany: Schöningh.
- Meyer, J. W. (2005). Der sich wandelnde kulturelle Gehalt des Nationalstaats. In G. Krücken (Ed.), B. Kuchler (Trans.), *Wie die westlichen Prinzipien die Welt durchdringen* (pp. 133-162). Frankfurt, Germany: Suhrkamp.
- Meyer, J. W. (2010). World society, institutional theories, and the acto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6, 1-20.
- Meyer, J. W. (2014). CV. Retrieved October 4, 2015, from <https://sociology.stanford.edu/people/john-meyer>
- Meyer, J. W., & Ramirez, F. (2005). Die globale institutionalisierung der bildung. In G. Krücken (Ed.), B. Kuchler (Trans.), *Wie die westlichen Prinzipien die Welt durchdringen?* (pp. 212-234). Frankfurt, Germany: Suhrkamp.
- Meyer, J. W., Boli, J., & Thomas, G. M. (2005). Ontologie und Rationalisierung im Zurechnungssystem der westlichen Kultur. In G. Krücken (Ed.), B. Kuchler (Trans.), *Wie die westlichen Prinzipien die Welt durchdringen* (pp. 17-46). Frankfurt, Germany: Suhrkamp.
- Meyer, J. W., Boli, J., Thomas, G. M., & Ramirez, F. O. (1997).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 144-181.

Meyer, J. W., Boli, J., Thomas, G. M., & Ramirez, F. O. (2005). Die Weltgesellschaft und der Nationalstaat. In G. Krücken (Ed.), B. Kuchler (Trans.), *Wie die westlichen Prinzipien die Welt durchdringen* (pp. 85-132). Frankfurt, Germany: Suhrkamp.

Werron, T., & Holzer, B. (2009). "Public otherhood": *World society, theorization and global systems dynamics*.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15, from http://www.uni-bielefeld.de/soz/we/soztheorie/werron/docs/Werron_Holzer_Public-Otherhood.pdf